

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開發

顏義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摘要

礦業曾經是臺灣重要的產業，於明鄭時期已有開採記載。至清代隨著臺灣鐵路開拓之進展，發現金脈而掀起一股淘金熱潮。及至日本殖民臺灣更將礦業開發列為產業重點，奠定臺灣礦業穩固的基礎。基隆顏家自清代移民臺灣，歷經四代即開創宏偉的企業王國，其過程亦足堪稱是臺灣人克勤克儉的精神表現，亦是移民臺灣的民情縮影。本文依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典藏發行之檔案圖書及有關基隆顏家的資料，探討顏氏家族由基業邁向偉業的成功過程。

關鍵字：基隆顏家、礦業、臺灣精神

壹、前言

礦業曾經是臺灣重要的產業，於明鄭時期便已有開採記載。而若探討臺灣礦業發展歷程，則「基隆顏家」的貢獻及影響力應無人能出其右。概乃顏家於清嘉慶19年（1814年）便有參與礦業開採的意欲，以務農兼撿礦的方式維持生計。及至道光5年（1825年）更轉換以採礦為生計主軸的營生模式。顏家也與所有移居臺灣的先民有相同的發展過程，冒險挑戰由唐山過臺灣，歷經華路藍縷的艱辛，逐漸發展而邁向小康。隨著時代的演變，劉銘傳開發臺灣，在基隆河八堵附近發現砂金，讓顏家奇蹟式暴增財富的傳聞此起彼落蔓延不絕。而後日本殖民臺灣初期，顏雲年成為日本警察的因緣際會過程及適時掌握局勢變遷的脈絡，不僅敲開顏家進入統治者領域之門內，更因能確實掌握契機而成為紅頂商人。

日本據領臺灣是兼具政治與經濟之目的，故於始政之初臺灣總督府設有內務、殖產、財務、學務、法務等五部¹以應統治之需。而隸屬於殖產部則有農商課、拓殖課、林務課及礦務課。其中礦務課業務是以礦業及地質調查為主，²當然也是推動礦業發展的政務機關。而臺灣總督府為確實有效的掌握礦業狀態，乃先於1896年（明治29年）2月初便陸續派遣技師石井八萬次郎、川住正德、坂基、西村三木雄前往瑞芳產金地進行礦業調查。³再於10月底派遣技師沖龍雄、西村三木雄前往臺北縣進行炭山調查，⁴為海軍尋求預備炭源。並派遣技師橫山壯次郎前往基隆調查金礦。⁵更於明治30年10月，由技手富田榮太郎、村田雄之

1 《民政局及地方官官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02006）。

2 《殖產部分課規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02031）。

3 石井八萬次郎，《瑞芳產金地調查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09001）。

4 沖龍雄，《臺北縣管內主要炭山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09004）。

5 橫山壯次郎，《基隆地方金鑛業取調概要》，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36004）。

助前往九份金瓜石探察基隆河床砂金。⁶事實上，臺灣礦業也是在日本殖民臺灣後始有計劃性的發展，而顏雲年適逢此契機並確切掌握運用，不僅為其家族開創無以倫比的財富，更因而奠定往後發展的基石。本文依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典藏、發行之檔案、圖書及有關基隆顏家的資料，探討顏氏家族由一般移民的草創開始，尋求基業的形成，並進而邁向偉業的成功過程。

貳、基隆顏家的事業啟航

乾隆40年間，顏浩妥率子由福建安溪金田渡臺，因地緣關係首居於中部大肚溪附近。但歷經10餘年的打拚卻因大飢荒而被迫返回福建並卒於安溪。嘉慶年間顏浩妥之子玉蘭、玉賜昆仲再度移居至梧棲、沙鹿一帶。由於地處偏僻故僅能捕魚為生。而當時「牽罟」是最為傳統的捕魚方式，此法頗需人手，故臺灣有「牽罟依索就分錢」的諺語，亦即見者有份的意思。當時一般漁戶主於居住周邊闢地旱耕，副以「牽罟」補家計。居住海岸的本土人幾乎是過著看天吃飯的生活。此種生計方式終非長久之計，加上長期族群對抗械鬥的影響，「顏氏昆仲」乃於1814年（嘉慶19年）再度遷移，由雞籠港入居暖暖碇內。⁷「雞籠煤炭於積薪無用之區，移置郡治即為無窮之利」，⁸因此於乾隆年間便陸續有本土人於閒暇之餘參與挖掘煤炭，售往內地作為墾田之肥料。⁹而顏家渡臺二世顏斗猛亦如同其他莊眾般，於1825年（道光5年）從事採煤於煥仔寮跌死猴之地。¹⁰此可謂是「基隆顏家」參與礦業開採之濫觴。由「居碇內凡50餘年，於咸豐3年（1853年）之亂，定內八堵之屋宇，均為燬

6 富田榮次郎、村田雄之助，《九份金瓜石兩礦山基隆川筋砂金場鑛業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35008）。

7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P90。

8 周鐘瑄，《諸羅縣志》卷十物產志〈物產〉P195，臺灣文獻叢書141種。

9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四賦役志〈煤場〉P111。

10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P94。

焚」。¹¹可知當時顏家的生活仍時有起落。但隨著採煤獲利及理財有道而逐漸增置山林、田地及茶園。除自耕外亦放與佃戶耕作收租穀或折現銀以維生計。尤其在錢滾錢的循環下，開始累積事業經營的資金。

一、改朝換代的權利變化

依據1891年清國貿易報告書，便已記載明鄭時期在臺灣北部的原住民採掘砂金，並遺留鑄造棒型金塊之土器，但卻無任何可考證其開採方法的文獻。其後陸續有西班牙人、日本人往來臺灣開採砂金，但或因數量不多而相繼離去。移民臺灣者因受傳統中原文化的影響，在家族結構上仍秉持宗族共處的觀念，故常自成為一生活集落。而顏家亦是如同，以從農兼採礦的方式經營家族，以維小康生計。1889年，劉銘傳建造臺灣鐵路時在基隆河八堵附近發現沙金，引發極大騷動並造成風潮。為便於管理乃建議劉銘傳設置金砂局廠，以招募職工篩洗金砂，但歷經數月收支難以平衡而廢撤局廠。當時本土人常往來臺北地區行商，聞悉有產金之土石乃於落腳地瑞芳店嘗試採取，數刻間便能得金砂數錢。其瞬間之利立即傳開，各方人馬如螞蟻般聚集於瑞芳店、三瓜仔、芋仔潭、龍潭堵、四腳亭、暖暖街、七堵、八堵等地方，人數甚至多達數萬人。1892年（光緒18年）基隆同知乃建議沈應奎於瑞芳開設金砂抽釐局，訂定章程管理，允許一般人民挖掘，但每人每日需抽釐金15錢，而若挖掘處是屬於私人土地則另需再徵收五錢。此外於四腳亭、暖暖街、五堵等地設置分局，換言之當時是採日繳釐金換照採金的制度。而此便是基隆河砂金採取及抽釐局的源起。¹²

幾乎與砂金發現之同時，風聞有人在九份山上發現金礦石一日獲得4、5兩或1、2兩。「挖到金礦」的傳言讓臺北、宜蘭的人民蜂擁而至。其開採的範圍更擴至大粗坑、小粗坑及大竿林等地，因此在九份山及大粗坑增設分局。1894年（光緒20年）5月又於金瓜石山上發現金砂，於是有數百人前來挖掘。

11 〈渡臺沿革〉，《（基隆）顏氏族譜》，P61。但顏家是於1814年遷移至碇內，故至1853年實際應為34年，而非50餘年。

12 內田精，《金鑛業取調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36004）。

當時臺灣主要的金礦區包括金瓜石、九份山、大粗坑山、小粗坑山、大竿林山、瑞芳及員山仔、龍潭堵、三瓜仔、笠石、魚架魚坑、大寮社、四腳亭、粗坑口、暖暖、八堵、七堵、六堵、水返腳等基隆河流域沿線。而要獲得砂金或金礦的挖掘許可可是就指定工作地點，組成20至30人的團隊並選出一名所謂「人夫（工）頭」負責，在相互保證下向金砂總局或分局提出申請。且除特別狀況外，為避免事務繁雜不接受個人申請。完成手續後，由官方交付記有局廠火印及挖掘地點的木牌許可證。此木牌必須於傍晚前繳回，翌日再領取，且無牌者不得執業。

於上述數處所採取之金，以金瓜石的品質最佳屬上等，含蓄紅土於內每兩價達38銀圓。瑞芳、四腳、八堵、七堵等河中所產者為中等，每兩給價36銀圓。九份、大小粗坑等地所產者則屬下等，其價每兩30銀圓左右。

金砂局是負責管理所有砂金的採掘事務，但所徵收的釐金卻幾乎流入官吏的私囊中，實際繳納至政府的金額微乎其微，甚至入不敷出。因此便於1893年2月以7萬5,000圓將所有產金地的採礦礦權標出。而承租五商行是由蔣樹柏、蘇秀冬、王廷理、潘成清及林英芳所組成，除林英芳持乾股外，其承租所費之資金由其他四人平均分擔。¹³但至同年7月期滿，五商行所得純益卻僅有5、6千圓而已。因此再度回歸官方管理直至日本殖民臺灣。

據悉劉銘傳築鐵路時，於基隆河發現砂金，讓顏家的資產一舉倍增數翻。當時是顏正春當家的時期，其人「天性樸實勤儉成習，忠厚之外復無他意，世以農自安，孝悌相承凡百餘年。正春偶採收砂金，獲巨利，蓋天授也¹⁴」。據悉在其此一時期顏家已累積相當的財富，若以當時的生計水準為依據，足以晉身於上流階層。然而隨著日本殖民臺灣的進展，顏正春¹⁵時任七庄總理義無反顧的參加「臺灣民主國」抗日活動以尋求臺灣獨立之際，卻因唐景崧等脫逃而宣告瓦解。但此行動卻讓顏

13 〈五商行係由〉，《基隆地方金鑛業取調概要》，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36004）。

14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18，P27。

15 顏正春為顏斗猛之子，是雲年、國年之季叔。

正春於1897年（明治30年）必須「到署參衙¹⁶」。當時「顏氏一家，昆仲惶顧，靡能自處」，¹⁷而時值青年之顏雲年乃「單身赴瑞芳，直面謁守備隊長」，¹⁸「藉筆談與憲辭論」。¹⁹或因其膽識、或感其孝義、或心惜其才而力勸「一為地方良民，一為皇軍而甄別良匪，俾能誠心誠意，建立軍民之間彼此感情，避免濫殺無辜，使其僻鄉能沐皇恩」。²⁰簡而言之，當時日方是採取招降納叛的懷柔策略，賦予顏雲年擔任日軍通譯之職。²¹此一際遇，不僅奠定顏雲年在家族中的地位，更鞏固顏家往後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基業及影響力。於此際顏家的領導者也由顏正春開始逐漸轉移至顏雲年。而顏雲年的事業層面更於1897年（明治30年）2月先成為瑞芳守備隊雇員兼通譯，再轉任巡查補並兼通譯，仕途順暢，甚至還獲得臺灣守衛混成第一旅團長內康少將的獎賞，²²可謂是典型的紅頂新貴。

二、藤田組與雲泉商會的關係

日本始政初期為便於管理暫時仍延續舊制，及至1895年（明治28年）9月16日發佈「鑛業規則」，²³規定除金以外的開採礦石暫允許舊業主於已開採區域經營。其中依據「砂金採取規則」²⁴嚴格限制採取者的資格，為便於管理更設置砂金署於瑞芳。此外於1896年（明治29年）1月11日配合「砂金採取規則」的修正禁止採金，²⁵換言之臺灣總

16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P123。

17 《顏氏家乘》卷十家傳〈陋園先生家傳〉，P445。

18 久保田章，《顏雲年翁小傳》第四章家系〈改隸當時之翁與軍警〉，有聲會編，基隆：編者自印，大正13年。P15。

19 《顏氏家乘》卷十家傳〈陋園先生家傳〉，P445。

20 久保田章，《顏雲年翁小傳》第四章家系〈改隸當時之翁與軍警〉，有聲會編，基隆：編者自印，大正13年。P15。

21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P129。

22 《保甲制度ニ關スル書類綴（第二號；元臺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9143001013）。

23 《鑛業規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08010）。

24 《軍組織以降九月ニ至ル殖産部事務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22011）。

25 《28年12月及29年1月中殖産部事務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0022013）。

督府將採金權力收回，並僅限日本人得以採金礦。²⁶其中九份的礦山改由以藤田組為主體的藤田合名會社所承包，由於開採困難故採金依然沿襲滿清時期的模式進行。²⁷金瓜石礦山則分別由田中長兵衛、迫田利廣及芳削龍藏等經營，²⁸由於較容易開採，本土人在金礦區域內僅能擔當雜役及搬運貨物等工作而已，完全禁止採掘。基隆河床則由淵上鄉右衛門、涉谷嘉助、山本盛房、林榮一郎、上田魁穗、種田誠一、河村隆實等經營。其中藤田組是於1896年（明治29年）10月8日獲得許可的礦區面積達193萬3,723坪，其礦區地形、礦脈狀態及與本土人關係皆不如於稍後26日獲得許可的金瓜石礦區，故在經營初期並不順利。當時各礦區所產金的價格如下表²⁹：

地名	金砂一兩	金塊一兩	採礦權擁有者
九份	28圓	34圓	藤田組
大竿林	34圓	34圓	藤田組
大粗坑	30圓	34圓	藤田組
小粗坑	30圓	34圓	藤田組
金瓜石	41圓	44圓	田中長兵衛等

當時藤田組及田中長兵衛先後獲得許可，但於同年11月7日位於「基隆川筋第一區第六號」的採礦權登記者為「顏雲年」。³⁰此是進入日治時期後的臺灣第一人，此因是依據馬關條約第五款「條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尚未遷徙者，酌視為日本臣民」，讓顏雲年以「日本帝國臣民」的身份具申請礦區資格。由此可知，當時顏雲年在此區域已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地位。

由於礦山多位於僻遠之地，亦是龍蛇雜處之區。日本雖然擁有絕對的統治權，但受限於語言隔閡及文化、思量、勞動態度的差異，導致管

26 富田榮次郎、村田雄之助，《九份金瓜石兩礦山基隆川筋砂金場鑛業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35008）。

27 熊田幹之助，《瑞芳金山巡迴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74017）。

28 富田榮次郎、村田雄之助，《九份金瓜石兩礦山基隆川筋砂金場鑛業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35008）。

29 熊田幹之助，《瑞芳金山巡迴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004574017）。

30 《明治33年度鑛業許可一覽》，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科課，1901。

理效果與實際狀態產生顯著的落差。而顏雲年於1899年（明治32年）在當時礦務課長近江時五郎的引荐下進入瑞芳分署以巡查補的身份兼任翻譯，同時承攬採金的管理業務。因擔任警察的身份具有公權力，又具有地方望族的淵源而擁有豐富的人脈及資訊流通管道，加上在語言溝通上沒有任何的障礙，所以才擁有比其他人強的「幸運及機會」。來到九份初期，協助當時的礦主藤田組處理採金礦工的招攬業務。進而逐漸擴大承包藤田組採礦物資、日用品及勞動力的提供等苦力頭經紀。但蠅頭小利的收入並無法滿足顏雲年的雄心，乃開始規劃籌措礦區承採。由於所需資金頗巨且風險過激並未獲得家族的認同。但在近江時五郎的支援下，終於開啟成就顏雲年在瑞芳邁向金山礦主的序端。³¹1899年（明治32年），顏雲年獲得藤田組於小粗坑的砂金地開採承租權，其經營初期是沿襲砂金署的規定模式，亦即任何人只要繳交牌費24錢，³²皆可進場採金。顏雲年的經營方式是以自己為中心，召募不同的投資者所構成的獨立式經營體，因此於1897年起便分別成立金裕豐號、金盈豐號、金盈利號、金興利號、金裕利號。隨著地方礦業利益發展日盛，慕名而來的謀工者接踵不斷，然因對外交通甚為不便，顏雲年乃結合當時瑞芳地區首富蘇源泉分段捐貲共築瑞九道路，並進而相攜興業成立「雲泉商會」。商號之經營，是以提供藤田組採礦、製鍊勞力，並及供應員工生活物資。³³

小粗坑的採砂金經驗提供顏雲年了解礦脈地質的知識，藉由經驗的累積讓顏雲年確實掌握瑞芳等礦山的資訊。反觀藤田組於1904年（明治37年）創下最高的產金量後，因誤判臺灣礦山的結構的特殊性及僅以人工與舊式混汞法提煉導致產量年年下滑。在入不敷出的經營狀態下，僅能陸續委託交付顏雲年承包。隨著顏家礦業發展的順暢，讓顏雲年人脈網絡關係更為擴大。尤其是1903年（明治36年）以名譽贊助員的身份前往大阪參加「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不僅其擴大視野，更因晉

31 近江時五郎，〈憶顏雲年君〉，《顏雲年翁小傳》，有聲會編，基隆：編者自印，大正13年，P225。

3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3年3月29日，570號P3〈金礦勞工〉。

33 〈株式會社雲泉商會〉，《臺陽公司八十年志》卷3，P121。

見長期合作的藤田組當主藤田傳三郎，而為往後事業開展奠定成功的基石。³⁴

顏雲年渡日歸來後，積極擴大雲泉商會的營業規模，幾乎皆能承攬礦區所有的機械搬運及物質供應業務。³⁵同時為求改善礦山地區的交通，與木村久太郎共組「基隆輕鐵株式會社」，同時更將事業版圖擴張至水產業及炭礦業。³⁶當時顏雲年是採行員工入股的投資模式，此舉雖然將利益與員工分享，但卻能博得員工的向心力，讓其往後事業的開展幾乎無往不利。1908年（明治41年）以後，凡藤田組直營的九份山大粗坑、大竿林各硯的諸項業務悉數歸由雲泉商會所承攬，甚至漸漸取代藤田組在瑞芳地區的礦山開採的主導地位。

三、瑞芳繁榮的開啟

如前述隨著金瓜石及九份山區金礦的發現，採金人絡繹不絕。而前往山區採金往返噶瑪蘭或臺北者皆以瑞芳作為中途補給及休息所。及至明治末期，瑞芳附近的礦山幾乎已歸顏雲年所掌控，因此顏家在九份的成長過程亦可視為是九份山城發展的歷程。顏雲年接手管理瑞芳礦山後，為了防範九份盛行盜金的惡風，乃廢除日本人原本集中管理的模式，除部份礦區保留直營外，大部份是採行層層承租的「三級包租制」。換言之將非直營的礦山區分為七再轉租給包商，而各區域亦可分租給其他礦工，並依採金量按比例抽成。而礦區之照明、通風設備及維護由完全由顏家負責。如此的經營模式迅速打破過去產金量不佳的流言，再度吸引各方人馬湧入九份。為一圓黃金夢的人潮，快速帶動九份聚落的發展，當時由基隆港遙望九份山城，燈火通明宛如不夜城，故有「小上海」的別稱。

「金瓜石、瑞芳、九份諸地金礦，清歷時代，洗金者時常千餘人。殆領臺之後，匪徒潛伏於山間，軍隊剿捕日急，

34 久保田章，《顏雲年翁小傳》第四章家系〈改隸當時之翁與軍警〉，有聲會編，基隆：編者自印，大正13年，P32。

35 《臺陽公司八十年志》卷3〈株式會社雲泉商會〉，P111。

36 顏窓吟《基隆輕鐵株式會社創業二十年史》〈創立當時ノ概況〉P4，基隆輕鐵株式會社發行，昭和8年。《臺陽公司八十年志》卷5〈臺灣水產株式會社〉，P240。

該管居民被累難堪，且遷徙異地而避鋒鏑，各金山幾成荒廢。厥後，匪氣殲滅，謀利者漸築巢而處，諸洗金客遂雲集以至，各成草寮屋舍比鱗若街市，其妓館酒肆徹夜燈火，比之舊時更覺盛興。聞之，金砂掘洗包辦人，則除內地人外，該地紳士顏雲年，凡給發牌札，頗洽輿情，所有稻人抵彼謀利甚為得意，每樂道其情狀，因爰筆以紀之」。³⁷

由文中可知悉顏雲年的社會地位，而「金瓜石附近金礦，幾年來甚見進步，其地曾設一局，主辦者為瑞芳區長顏雲年。曾向該礦主包購，凡諸洗金之人，准予該局給領鑑札，惟每日須納鑑札費若干。如其無鑑札偷洗者，該局得以稟官拿辦，文開辦甫一年度，至今結算，竟得利至萬內圓，可謂巨矣。然辦局者如此，洗金人亦可知矣」。³⁸更反應顏雲年在瑞芳地區「喊水會結凍」的影響力。當時顏雲年的經營模式是「上結達官貴人，下交販夫走卒」，換言之其交際手腕之精妙已足以讓其在礦區通行無阻，完全掌握。如此顏雲年由「紳士」變身為「區長」，由「區長」轉為「承包人」，由「承包人」再晉身「金砂局長」、「瑞芳富商」。其社會位階的晉升也反應於財富的累積過程，同時也興旺瑞芳地區的發展。九份山的人口由以往未滿千人的集落一躍成為萬人之黃金城。其景況「由九份礦山事務所，沿石階緩緩而下，忽可抵稠密之街頭。該處約有50戶本土人商家並軒羅列。於異香撲鼻的鴉片味間，忽見豬肉、雞肉商標的料理店。既有販賣點心的黑衣老婦、亦有濃妝艷抹五寸金蓮的嫖妹。煙草店、洋品店人聲鼎沸」。³⁹

「九份礦山為千尺之山，暮然回首山既不如山，亦非空漠僻地，卻置於奧境深山，移來夥眾商家。蓋彼等對於有利可圖之處必定前來。彼等以何種人為客乎，既非金山事務員、也非礦夫，其乃對採砂金之勞動者也」。⁴⁰這些勞動者皆歸屬於顏雲年之旗下，換言之九份礦山的繁榮是緣自於顏雲年對瑞芳地區的開發，而在利之所驅的誘惑下來自各地的

3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4年12月26日，1097號P4〈金山日盛〉。

3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5年1月25日，1119號P4〈金礦勝利〉。

39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7月26日，1571號P2〈金礦視察記〉23。

40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7月26日，1571號P2〈金礦視察記〉23。

採金者絡繹不絕的湧現，也造就瑞芳、九份的繁榮景象。

四、龐大基業的形成

金礦開發是構成顏雲年「點石成金」偉業的基礎，讓其在瑞芳獲得最高社經地位的認同。而作為能源的煤礦則是極速擴大發揮其事業規模的根本，讓其事業王國的影響力達到最高峰。

臺灣的炭礦因煤層稀薄且多斷層，若採掘觸及斷層則一切歸空。加上本土礦工有夜不入坑的習慣，此個性直接影響工作效益，導致產能無法完全發揮。故其生產費用與售價間僅有四圓的微薄利潤而已，若稍有閃失不僅無利可圖，甚至陷入血本無歸的困境。日本殖民臺灣初期，雖然採行延續清代舊慣的開採方式，但期滿後便陸續遭到撤銷續採的權益。換言之日本統治後，所有的礦戶必須依據「鑛業規則」的暫行條例重新申請。而後臺灣總督府更於1896年（明治29年）6月1日以律令第6號頒布「臺灣鑛業規則」，受理鑛業權的設定申請。在此之前日本資金除了賀田組外，幾乎無資本家願意從事臺灣炭礦開採，故其經營方法尚屬於簡陋且粗糙的模式。亦即除一、二處有鋪設輕鐵道外，幾乎是必須仰賴人肩搬送進入基隆河運輸，由於其耗費人力甚巨，故完全沒有競爭力可言。⁴¹但是隨著藤田組於1896年（明治29年）取得瑞芳鑛山後，其不僅投入龐大的資本，也購買現代化的採礦設備，更規畫大規模開採九份、大竿林、大小粗坑等礦區，此舉讓臺灣的鑛業開發邁向另一新的里程碑。

「基隆顏家」在清代末葉北遷從事採礦便以挖煤為業。因「三世出入鑛坑內」故其應是清代所謂的「煤戶」，領有官方之「執照」得以與煤田業主立約採煤。承襲祖上的顏家可謂具豐富經驗的煤戶，躊躇於斯業自然有得天獨厚的先機，然事實上至1903年（明治36年）以前，顏家並無再投入此業之跡象。而其轉變是顏雲年於上述參觀「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之鑛業館後，對煤礦開發有另一嶄新的見解。因此開始在雲泉商會的既有基礎上擴大經營層面，不僅留意煤礦探勘的訊息並積極申

41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9月13日，3513號P4〈本島石炭の將來〉。

請開發。於1904年（明治37年）1月獲得三瓜仔石炭區的採礦權，續於同年12月20日再獲其故居附近石炭區的採礦權。翌（1905年）8月申請獲得龍潭堵庄石炭區，並購買猴硐庄礦區。其所採掘之煤炭主要是供應臺灣南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製糖廠作為燃料之用。在大量需求的激勵下，煤礦生產於1901年（明治34年）至1907年（明治40年）由64,319噸倍增至134,186噸呈現逐年增長。⁴²尤其隨著臺灣縱貫鐵路於1908年（明治41年）4月20日的通行，北炭南運也因而興起，但當時開採技術尚屬幼稚落伍、煤質低劣且混雜砂土而多遭到南部糖廠捨棄，改由日本進口。當時臺灣煤礦面對如此衝擊，在採礦投資上便稍顯停滯的猶豫。但顏雲年卻另有不同遠見，認為未來掌握能源者必能勝於一切，乃致力於礦區的申設，並尋求日本人加入參與經營，因此產量也擴增為153,099噸，此量已足以供應臺灣島內使用，同時亦能運銷至對岸。⁴³

所謂「人要致富，首要開路」，炭礦經營首重運輸，而顏雲年之礦區多位於基隆石碇間，因此於1914年（大正3年）先組織基隆、瑞芳間的輕鐵會社讓輕軌鐵路設施能因而接續至基隆。起於基隆終至三瓜仔的單線輕鐵朝夕運轉，省卻顏家不少經費，但因裝載力有限且山勢逶迤僅能載貨搭客，運炭績效並不大。而後雖隨著龍潭堵、深澳坑的開採而擴增為複線，並鑿開隧道截彎取直以擴張運輸能力，但當時八堵瑞芳間並未興建鐵路，因此顏雲年乃積極運用關係尋求官營鐵軌由八堵延伸，溯基隆河經四腳亭以抵瑞芳。⁴⁴

運輸架構既已成型，顏雲年便立即著手改善採掘之法。顏雲年因長期觀察本島人採掘之法，擬採其長補濫掘之短。亦即「隨炭層之厚薄，側身採掘如兔營窟、如狸穿穴，但其得炭，炭盡則止，不必坑道廣闊多用坑木，而後收功」。⁴⁵

雖然石炭發展遠景已逐漸為顏雲年所建構，但多重身份幾讓其無餘力專心參與企業經營，因此開始培養其弟顏國年協助經營，並逐步放

42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P180。

4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2月25日，3244號P3〈石炭有望〉。

44 《臺陽公司八十年志》，〈文徵〉P474。

45 顏雲年，〈炭坑經營論〉，《臺灣鑛業會報》，大正4年，第14期。

手代為執行。顏國年進入顏家企業王國後先擔任瑞芳坑場長，並兼任瑞芳輕鐵株式會社取締役（董事），期望由直接參與的過程學習企業經營之術。1914年（大正3年）7月28日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銅、硫磺、煤等礦產價格節節高漲。面臨戰爭的天時、擁有礦區的地利、加上確實掌握瑞芳地區三教九流的人和，讓顏雲年被視為是天之驕子，機運可謂空前旺盛。當時顏雲年更引進「氰化製煉法」煉金，由於大幅提升獲金率，故坐擁極為豐厚的利益。而顏國年更配合其兄長之經營意向，不僅加速礦區探勘迅速提出申請或收買經營困難的礦區，更動用長期建構的人際關係，積極爭取「未許可礦區」的開採權。顏雲年於1918年（大正7年）取得由日本宮城縣人玉城孝次於1912年（大正元年）8月14日許可礦第1,130號位於臺北廳石碇堡暖暖街碇內庄四腳亭地內礦區面積377,759坪的讓渡權。⁴⁶同時提出採掘石碇堡十分寮庄、石底庄及文山堡大溪墘庄、玉桂嶺庄等附近炭礦之申請，⁴⁷當時是必須經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礦務課就區域地形及產量進行評估，同時也必須經過如今日之環評，判斷是否會產生公害。而「炭礦經營，首重搬運，搬運已便，則可擴張採掘，無汲長鞭短之慮」，⁴⁸因此交通運用的網絡建立是攸關煤礦開採成否之要件。為確實解決煤炭運輸的問題，顏雲年曾考慮以纜車方式翻山越嶺輸送，但顧及長遠大型開採機具與人員運送的不便，且無助於相關產業之開發而作罷。足見顏雲年的投資模式是有長遠性的考量。而此時適值臺灣總督府規劃興建宜蘭鐵路，顏家乃配合鐵道部的路線規劃，運用鐵路銜接的方式自行修築石底鐵道。此舉不僅可降低轉運裝卸的損耗，更可提供作為設備及人員的交通運送工具。基於對上述交通的期待，顏國年乃於1918年（大正7年）尋求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調查自猴洞穿越十分寮至菁桐坑路線建設之可能。其間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到世界經濟緊縮的影響而多有延誤，及至1921年（大正10年）始鋪設完成⁴⁹，共耗費資金230萬圓。由於妥善的規劃及積極的執

46 顏雲年鑛業權讓渡許可，臺灣總督府檔案第2,823冊第15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00002823015）。

47 《臺北鑛業會社鑛業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00002823018）。

48 顏雲年，〈炭坑經營論〉，《臺灣鑛業會報》，大正4年，第14期，P 8-14。

49 《臺陽鑛業公司四十年誌》，P 54。

行力，讓顏家在短短的數年間共擁有59處礦區，面積達21、104、842坪的煤炭區。⁵⁰於此一期間，顏家更因獲得藤田組的高度信任，而將採礦業務陸續轉讓，顏家也逐步成為主導臺灣礦業的重要角色。

顏雲年對於礦業規劃確實有其獨到的見解，而促使其成功的要素，除了具備礦區勘查及經營決斷的能力外，⁵¹更因其平時重情義、知恩德的作為，皆直接或間接對其事業發展衍生出相當的助益，甚至是最後發揮臨門一腳的決定功能。以1913年（大正2年）與簡阿牛競標的「逆轉勝」便足以說明其平時「交陪的深厚及為人的真誠」。而對於曾經協助其事業版圖擴充者，顏雲年也勢必會適時的予以回報，其包括招請前大阪本社高級幹部長濱實來臺任基隆炭礦役員會秘書，⁵²前基隆廳長橫澤次郎任基隆炭礦株式會社之監查役。⁵³更優卹病卒於任內的高橋仁之助，⁵⁴而廣獲礦業界贊許與欽佩。同時因受恩於藤田組的知遇，更表達願意優先任用既有員工，故於1914年（大正3年）接續藤田組經營礦務事業後仍然有近三分之一的員工留任受聘。此「不以私自己、願以公利人」的胸襟，本持「誠懇待人、利益與共」處世態度，奠定「基隆顏家」往後開擴企業版圖的基礎。

由於日本帝國將臺灣視為是其南進的跳板，故於1916年（大正5年），探勘臺灣各地礦業時，其國內的三井物產、三菱鑛業、久原組等大財閥亦陸續參與介入。其中三井物產更著眼於北部煤礦，因而迅速與顏家建立密切關係。但因涉及利益龐大故彼此競爭也極為激烈，此讓顏雲年的煤礦大業必須面臨更艱鉅的挑戰，甚至左右其往後事業發展走向。⁵⁵幾經多方折衝乃於1918年（大正7年）2月28日召開臺灣炭礦株式會社第一次股東大會，顏雲年被選為取締役、顏國年被選為監查役（監事），是僅有的臺灣人，而採炭業務則歸由顏家承辦以便管理。其後配合股東成員改變於同年9月併入新成立的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基隆炭

50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P206。

51 顏雲年，〈瑞芳礦山經營管見〉，《臺陽公司八十年志》，P471。

52 《臺陽公司八十年志》，〈長濱實傳〉P459。

53 《臺陽公司八十年志》，〈橫澤次郎傳〉P392。

54 1902年任基隆警部補，後轉入藤田組任庶務課長，1915年受僱於雲泉商會。《臺陽公司八十年志》，〈高橋仁之助傳〉。

55 《臺陽公司八十年志》卷11，人物下〈芳川寬治傳〉，P450。

礦株式會社因總社位於基隆，且礦區分布多在基隆廳因而以此命名。此會社的經營是由三井會社所掌控，故當時臺灣人的認知是將其視為「三井會社」，對於大股東的顏家反而甚少提及，甚至顏家也認為僅是參與投資而已，並不認為是自家所能掌握的事業體。由於政治介入構成三井居大、顏家次之的不平等股權比例狀態，皆顯示日本對臺灣資源壟斷企圖。而其後遺症是當「臺灣光復後」被視為是敵國資產而列入接收範圍，讓顏家自始至終皆未曾擁有實際的經營權。⁵⁶

總而言之，顏雲年所建立的企業王國，其功業是將「草木不茂之荒山」轉變為「千數十戶之山市矣」。⁵⁷以金興利為主的總管理處，旗下有同利、建利、建成、榮利、和利、和利、金福利等分支，各有無數的礦主及總計3千餘名的礦夫。至1916年（大正5年）顏雲年名下之礦區已達一萬甲以上，足稱為臺灣第一。

參、邁向企業王國之臺陽

基隆顏家的基業是始於顏雲年於1899年（明治32年）設金裕豐承租瑞芳礦區，招攬採金人領牌洗金。於1902年（明治35年）設雲泉商會承包礦區業務，雖曾因蘇泉的遽逝而陷入拆股的分裂，但在顏雲年的堅持下安然渡過危機。於1904年（明治37年）取得三瓜仔煤礦開採權，爾後陸續獲得猴硐、瑞芳附近及深澳、平溪石底、五堵、三峽、板寮等地之採礦權而奠定基隆顏家的礦業基礎。1913年（大正2年）開始，藤田組所開採的礦脈逐漸呈現貧瘠，金礦石中的含金比例越來越少，乃決定減少在臺之投資，放棄礦山的直營事業，當時除顏雲年承租外，新竹名紳鄭肇基家族，樟腦兼礦山業者簡阿牛，以及藤原的日人都積極周旋運作，希望能獲得礦權。最後由繼承藤田傳三郎事業的長子藤田平太郎決策，因信任顏雲年多年投注心力經營瑞芳礦區，於1914年

56 顏惠霖〈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創立真相〉，《臺煤雜誌》第563期，P29，1987年。

57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10月23日5860號，P3〈瑞芳礦山一瞥談〉。

（大正3年），將全區採礦權以30萬日圓、期限七年出租給顏雲年。顏家承租藤田組位於瑞芳的所有礦區後，始真正發揮其經營的能力，而為落實營運之順暢，乃於1918年（大正7年）2月改組為株式會社雲泉商會，旗下設有金物（五金）部、坑木（採礦）部及請負（承包）部，⁵⁸「基隆顏家」此時擁有70%的股份。同時更與藤田礦業株式會社合資成立「臺北炭礦株式會社」，而由八堵至瑞芳的鐵路也於1919年（大正8年）開通並於瑞芳設站。⁵⁹當時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物資需求擴大的影響，礦物價格節節上漲。但曇花一現的榮景假象立即被蕭條的浪潮湮滅，慘跌的趨勢幾乎讓所有的開採計畫工程頓時停滯。導致藤田家的財務運作也陷入日形見絀的困境，為填補長期虧損的缺口，乃決定結束臺灣事業。歷經多次折衝協商，最後於1920年（大正9年）9月6日由顏雲年以500萬元的資本額收購臺北炭礦株式會社位於臺北縣基隆區平溪鄉石底方面的煤礦區，並重新整併改組臺北炭礦株式會社，同時再合併顏家各關係企業及株式會社雲泉商會所經營之瑞芳金礦所，而創立臺陽礦業株式會社。⁶⁰及至1923年（大正12年）顏雲年過世，因顏氏兄弟齊心開拓事業，臺陽王國旗下擁有礦業、交通、木材、金融、水產、造船、倉儲、化工、拓殖、食品、保險等領域的事業，關係企業達50餘家。

而其所遺留的龐大事業，則是由其長期培養之弟顏國年承繼。⁶¹顏國年個性溫和公正，縝密熱心，待人接物之能力不亞於其兄長。由於顏家事業已奠定雄厚的基礎，加上長期受其兄長的薰陶及教誨，對事業的雄心壯志及對企業的擴展企圖不僅未因兄長之遽逝而稍有停滯，反而更能稟承其遺志、補其不足而更發揚光大。此際「基隆顏家」隨著與官商各界交流之頻繁，事業版圖迅速擴張。其營運重心除了原本的礦業外，更在動產、不動產及有價證券的買賣上投入相當的心力。於積極尋求事業邁向多角化經營層面之同時，顏國年也思考將其事業的觸角拓展至對

58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7年4月17日6399號，P1〈株式會社雲泉商會〉。

59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5月6日6783號，P7〈八堵瑞芳間開通〉。

60 《臺灣陽公司八十年志》，〈賀田金三郎傳〉，P447。

61 《顏雲年翁小傳》第28章，有聲會編，基隆：編者自印，大正13年，P123。

岸的中國大陸。其中1924年（大正13年）隨著顏國年前往大陸參訪的契機，對於中國豐沛的煤礦曾展現相當的興趣，尤其藉由對山西礦業的關注，而結識閻錫山，讓其影響力擴及對岸，也開啟顏家擴大事業版圖的契機。然而正當企業成長發展之際，顏國年也步其兄早逝之後塵，於1937年（昭和12年）辭世。

因顏國年秉公待人的處世態度，「基隆顏家」的事業於其過世後，由顏雲年長子顏欽賢繼任，事實上早於1936年（昭和11年）10月雲泉商會便被解散併入臺陽礦業株式會社，同時接手該株式會社所有之海山煤礦。及至1938年（昭和13年）再合併顏家關係企業之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所有之臺北縣海山區鶯歌鎮大湖方面16礦區，同時配合增資的運用，聚集1千萬元作為開發金、銀、煤炭等共59礦區之資金。然而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緊迫發展，日本政府為有效掌控戰略物資的統籌運用，乃於1940年（昭和15年）經由臺灣總督府引進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直接介入臺陽的經營。⁶²

肆、顏欽賢的事業發展

身為臺陽礦業創業主顏雲年長子之顏欽賢，因長期受祖傳事業耳濡目染的浸潤，對礦業經營有相當的認知，加上家族刻意栽培亦造就其對礦業經營擁有獨到的見解。初入事業體先以礦工之身由基層採礦學起，以明礦業實務經驗，再按部就班的進入管理階層學習經營之道。至1929年（昭和4年）12月始擔任臺陽礦業株式會社取締役。因承先人所遺之礦業知識而精通採冶，更因往來學習而了解營商之道。1932年（昭和7年）開始擴大學習領域，兼任瑞芳輕鐵株式會社取締役。1934年（昭和9年）再兼株式會社雲泉商會取締役及基隆炭礦株式會社監查役。1935年（昭和10年）晉升為株式會社雲泉商會常務取締役及

62 顏欽賢，《為懇請敝社日股准予贖回由》，煤礦公司接收部分日人股本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040000350021）。

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常務監查役，開始實際負責企業之經營。配合時代之變化及環境之需求於1936年（昭和11年）11月解散株式會社雲泉商會，併入臺陽礦業株式會社之經營體系內。及至1937年（昭和12年）顏國年的過世，顏欽賢承繼擔任臺陽礦業株式會社、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瑞芳營林株式會社、基隆輕鐵株式會社等會社之取締役社長及基隆炭礦業株式會社等會社之代表取締役。於此際「基隆顏家」進入第四代的經營，亦開啟顏欽賢時代的序幕。

作為「基隆顏家」代表的顏欽賢，因交遊廣闊且頗獲認同而具聲望，於地方皆被推舉接任公私諸項職司之代表。其事業盛況也超越先代，於1937年（昭和12年）計有金、銀礦區3處，金礦區1處，砂金礦區1處，共同砂金礦區1，石炭礦區50，共同石炭礦區3，總礦業面積達22,577,551坪（約7,543甲），⁶³可謂為當時臺灣人企業經營之冠，故其在臺灣的影響力甚至不遜於日本礦業大財團。而後隨著日本礦業株式會社之南來，先於1938年（昭和13年）配合日本政府「國家總動員法」及「有限會社法」的施行，伺機介入臺陽事業的經營，進而併吞納為日本所有，因此顏欽賢順勢於同年將臺陽資本擴大為1,000萬元的會社，藉以提升交涉實力。但日本礦業財團更於1940年（昭和15年）藉由臺灣總督府的政策推動，以箝制或壓迫的方式，使盡惡辣手段策動強買臺陽礦業株式會社之大量股份。⁶⁴此外，日本礦業更以大股東身份強薦派來村上敬二擔任臺陽之金礦部長等董監事。處在情勢比人強的惡劣環境下，顏欽賢尚能權衡局面得失及洞燭先機以應，不僅讓臺陽礦業在惡劣環境中圖存求生，更藉由與日本企業合辦經營的過程尋求擴展企業之壯大。同時在可能的範疇內盡量維持臺灣資本經營的模式及延續先人創業精神，致力讓本島人的企業能依然樹立於世。然而隨著1941年（昭和16年）太平洋戰爭戰況的激烈變化，加速日本對經濟統制的掌控程度，不僅採取更嚴厲管制戰略物資，更直接干預企業之經營。而這也是日本帝國政府延續戰力圖求生存的最後一搏。但作為臺灣礦業開發的第一人

63 《臺灣礦區便覽》，昭和12（1937）年度，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1938年12月。

64 〈請求發還被日人強制收買之土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315520027009）。

者臺陽礦業株式會社自然也首當其衝，只能配合因應以減困擾。當時瑞芳地區黃金藏礦逐漸衰竭，礦砂含金量大幅降低，加上成年男子多被徵召服勞役，礦區在欠缺勞工的環境下，自然也影響採金作業的進行。隨著日本戰勢的吃緊，在迫切需求戰略金屬下，屬於非國防物資的金礦自然被擱置，因此金瓜石轉為以改採銅礦為主。為便於掌控臺灣總督府乃派遣臺灣銀行之高井廉造進入臺陽擔任常務取締役，意圖直接介入臺陽的經營管理層面，以掌握資源之供給。而顏欽賢雖不至於直接迎其鋒銳冒然頂撞，但卻能結合上下頡頏，讓日本人難以仗官方之權勢輕而易舉的掌控臺陽營運。但至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下令礦區事業必須完全支援軍需國防物資之需用，導致臺陽在瑞芳礦區的生產被迫停工。

1945年（民國34年）8月15日隨著太平洋戰爭結束及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於11月開始在臺灣進行接收工作。其中原屬於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的金瓜石礦區，依據臺灣省日資企業處理辦法之規定，應列為官商合辦經營。在此期間因戰後復原經濟衍生的通貨膨脹，不僅帶來嚴重的經濟蕭條，也導致九份、金瓜石一帶盜金風潮盛行。俗稱為「散花仔」的盜金客甚至攜帶武器和開採工具，毫無忌憚的入坑私採，所採之礦砂以土法提煉收集黃金，導致黃金交易在黑市極為活絡。當時黃金是允許自由買賣，但白銀則仍為統制物品，不得私自買賣，因此由臺灣。⁶⁵而後為便於掌控及管理之需要，於1946年（民國35年）11月完成接收後，礦業部份歸為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管轄，其中貴金屬由臺灣金銅礦務局負責，金瓜石礦山納入政府體系內成為國營事業。而煤礦則歸由臺灣煤礦公司接收。至於民營企業中含有日方資本者，則列為官方資本。顏欽賢等為尋求民營的自主空間，乃結合中臺礦業株式會社代表人顏德潤、顏滄海等尋求優先購回日本人所擁有各自公司的股份。⁶⁶由於顏欽賢等據理力爭，最後終以優渥的條件適當的價格收回日本人所持有

65 〈煤礦公司組織改組核准案〉《工礦處煤礦公司組織》，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301240155001）。

66 〈煤礦公司接收部分日人股本案〉《工礦處煤礦公司組織》，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301240155002）。

的股份，讓臺陽礦業再度完全歸入「基隆顏家」的企業版圖中。而之所以有如此之結果應歸功於顏欽賢長期以來與官方折衝的經驗及了解法律運用的巧思。

進入國民政府統治後，顏欽賢依然秉持傳統的經營模式繼續礦業權登記之申請。⁶⁷並於1947年（民國36年）7月將所屬企業體改組為臺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但隨著國民政府對金礦及黃金交易採取管制策略的施行，連帶也影響臺灣金礦的開採。況且處於混亂的時局中，容易帶動物價指數狂飆亂漲，導致產金成本也相對提高，即使金瓜石產金是完全由臺灣銀行以統一價格收購，但一日數市的通貨膨脹壓力仍難以立即反應生產成本，故必須另行開發銅礦採掘及選煉工程以攤還。1955年（民國44年），配合國營事業企業化政策之推展，臺灣金銅礦物局改組為「臺灣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更擴大壓縮顏家在金銅礦業的發展。但1960年代國際金價持續低迷及金礦蘊藏量已竭盡，採金幾無利益可言。

反觀煤礦卻因能源需求而逐年成長。1947年（民國36年）臺陽的產量為130萬噸，1948年為160萬噸。不僅供應島內需求，更可遠銷上海、廣州。1949年以後兩岸隔絕，當然臺灣煤礦也無法再輸往大陸，導致私人礦業發展受到限制。但臺陽在顏欽賢的堅持下，依然持續經營祖傳基業。1951年（民國40年）美國經濟援助，開始給予採礦技術指導，⁶⁸及至1961年臺陽公司的煤炭產量仍保有28萬噸，依然遠高於居次的瑞三煤礦公司。但隨著能源使用習慣的改變，石油及天然氣取代煤炭的功能，加上煤礦及金礦的蘊藏枯竭且礦災事故造成的損傷，導致臺灣採礦事業逐漸陷入衰落，連帶也影響「基隆顏家」企業版圖的配置。雖然1971年顏家正式結束金礦的開採，但其配合臺灣經濟發展所衍生的行業依然活躍於臺灣，甚至全世界。1978年臺陽公司創立60周年時，旗下關係企業達36家。其跨越的行業包括造船、觀光、客運、船務、金

67 〈臺陽礦業顏欽賢申請開採臺北蘇澳金銅礦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347522009024）。〈礦業權登記申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00347522007127）。

68 「臺灣省政府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生管會檔案』，0110197102，1952年9月。

屬、機械、化工、煤礦、貿易及土木建設等。

在龐大財富的背景下，加上光復後立即加入國民黨的作為，增添顏欽賢擴大政商網絡關係的機會。除1945年（民國34年）榮膺「臺灣煤礦公會」創會會長，1952年（民國41年）任「臺灣省煤礦工業公會」理事長等社會團體領導人外。於1946年（民國35年）3月被推舉為基隆市議員，並於4月選為臺灣省第一屆參議員，11月更經由參議會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前往南京參與憲法制定。1949年（38年）國民政府遷臺後，顏欽賢更被聘為臺灣省政府委員，並於1969年（民國58年）再度當選國民大會代表。上述的作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已被視為是臺灣人的代表人物，是在國民政府中具有影響力的本島人，一直至1983年（民國72年）顏欽賢過世為止。

基隆顏家歷經百年的經營，其企業版圖的變遷整理如下：

戰前	戰後	現今
雲泉商會、海山輕鐵、基隆輕鐵、瑞芳營林、臺灣興業信託、臺灣拓殖製茶、東洋木材、臺灣水產、東亞興業、金包里礦業、大正興產、基隆船渠、基隆驛傳社、臺灣驛傳社、臺東拓殖、基隆商工信用組合、南洋倉庫、臺灣倉庫、振南貿易、臺東製糖、臺灣電器工業、臺北鐵道、臺灣肥料、華南銀行、瑞芳平溪線、臺灣輪業、大東工業、帝國苧麻紡織、大正醬油、阿猴製糖、臺洋漁業、大成火災海上保險、臺東開拓、基隆商工信用等。	臺陽礦業、蘇澳造船、基隆第二信用合作社、三陽企業、臺北汽車客運、三陽船務代理、三陽金屬工業、臺灣新東機械、臺陽合金工業、瑞芳工業、臺陽工業等股份有限公司、光隆家商。	三陽企業、三陽船務代理、三陽金屬工業、臺灣新東機械、光隆家商等。

伍、結語

臺灣因具有極端的變動性、複雜性及未知性，加上「臺灣錢淹腳目」的誘惑，讓無數的「唐山客」寧願冒險來此尋求發展的機會。雖然臺灣海峽的黑水溝埋沒無數「出師未捷身先死」者，所謂「唐山過臺灣，10人去6人死3人居一人倒轉去」，但為一圓「臺灣夢」的移民，並未因而畏懼退縮，前仆後繼蜂擁而至延續不斷。移民臺灣對「基隆顏家」而言是新契機的開始，也是邁向新天地的序端。其先祖顏浩妥於乾隆50年（1785年）的挑戰，縱然歷經10年的奮鬥，卻因大荒致損資本而黯然束裝歸閩，並因而鬱卒逝於安溪烏塗。但臺灣的魅力及對未來的憧憬並未從此斷念，其子玉蘭、玉賜昆仲再次於嘉慶年間捲土重來臺灣中部，濱海而居於棲附近，但以漁為生計的牽掣工作畢竟收入有限，不穩定的生活終究非長遠之計，因此再度選擇離開，但此次並非渡海歸閩而是轉移前往臺灣北部之基隆開採煤礦。至第二代顏斗猛參與採礦後，不僅改善家庭生計，也開啟顏家成為臺灣礦業發展的關鍵。由於辛勤努力的傳統本性，積有餘資始能購荒地闢良田，也開始在基隆落地生根。及至第三代顏正春基隆河傳奇性採金致富的傳奇，讓顏家明白礦業致富的魅力。但隨著臺灣統治者的替換，也逐漸由顏雲年取而代之。顏雲年的遽逝，歷經其弟顏國年的中繼，再傳交至顏欽賢，一脈相傳的努力經營，開創令人仰慕的輝煌成績。

試想，若顏浩妥沒有播下移民臺灣的種子，顏玉蘭、玉賜昆仲放棄未再挑戰，而或安份留守中部、顏斗猛未積極參與採炭，甚至甲午戰爭滿清未敗或馬關條約未割讓臺灣與日本，顏正春未參與臺灣民主國，顏雲年不挺身而出，且日本不予重用等任何一環節沒有接續到，則「基隆顏家」的發展可能就不是這樣。事實上「基隆顏家」的發展是與所有移民一樣，是歷經第一代的冒險犧牲，第二代的伺機而動、第三代的穩定積本、第四代的一舉成功。而此一舉便是命運的安排與機會的掌握。「基隆顏家」崛起於日本殖民臺灣初期，其家族是建立在漢人意識型態及儒家傳統的思想的基礎上，並能迅速結合日式的西方思維模式

與企業理念，在勇於冒險挑戰基因的推動下，確切發揮臺灣人克勤克儉的精神。尤其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面對西方思潮和科技進化的威脅與衝擊，亦能本持儒家傳統思維的延續及肩負家族興隆與共的責任，於逆境中積極尋求突破，於實踐中結合同好之群力，展現儒家的思想本質及發揮完美的家族意識，並將其擴大為企業精神。而顏家自栩為季聖顏回之後，是受儒家正統教養，故顏欽賢常自豪顏家是「孔孟之後、臺灣第一」。

移民的發展過程是「頭代開路，二代落根、三代勤儉、四代結成果」。而「基隆顏家」移民臺灣，發展至顏欽賢世代幾近200年的期間，顏家可謂「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換舊人」「承先啟後」的接續發揮長才。同時當家者也皆能適時的反應時代的需求、適切的承擔當家的責任，完成被賦予的階段性任務。在此因果下，迅速紮實累積財富。亦即「基隆顏家」是因「時勢創造英雄」，也是因符合時代潮流，掌握經營脈絡，尤其是在逆勢中展現臺灣人的韌性與耐性，故其成功絕不是偶然。臺灣俗諺「小富靠儉，中富靠勤，大富靠看準，而巨富則要靠天命」，而這也正是「基隆顏家」一路發展歷程的寫照，其之所以能成為巨富，正是臺灣人認真打拼「一步一腳印」累積財富的成果表現。

參考書目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 《臺灣礦區便覽》，昭和12年（1937年）年度（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1938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 「臺灣省政府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生管會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1952年）。
- 周鐘瑄，《諸羅縣志》卷十物產志〈物產〉，（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
-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四賦役志〈煤場〉，（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
- 顏欽賢，《顏氏族譜》（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年）。
-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18年）。
- 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年）。
- 唐羽，《顏氏家乘》（臺北，臺陽家族，1996年）。
- 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臺陽，1999年）。
- 有聲會編《顏雲年翁小傳》，（基隆，久保田章，1924年）。
- 《明治33年度鑛業許可一覽》，（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科課，1901年）。
- 《臺灣日日新報》（1895 - 1925年）。
- 顏窓吟，《基隆輕鐵株式會社創業二十年史》（基隆輕鐵株式會社發行，1933年）。
- 《臺灣鑛業會報》，（1915年）。
- 《臺煤雜誌》第563期，1987年。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mining development in Taiwan's

Keelung Yen family

I-fang Yen^{*}

Abstract

The mining was once an important industry in Taiwan. It has been documented during the Ming Zheng period. To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 of Taiwan Railway, found gold veins and set off a gold rush. The industry focus on mining development from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Taiw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aiwan's mining. Since the Keelung Yen family immigrated to Taiwan from the Qing Dynasty, after four generations that create a magnificent business empire, the process is enough to be call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iwanese spirit of diligence and frugality, is also a microcosm of immigrant sentiments in Taiwan. The paper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on and release of the files and the books about the Keelung Yen family from the Taiwan Historica, investigate from the zero towards the great undertaking of the process of the Yen family.

Keywords : Keelung Yen family, mining, Taiwan spirit

* Taiwan Historica Researcher